

文化力提升与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

——以浙江为例

陈寿灿 颜建勇 黄文平

提要：文化力是指一定的文化模式在经济社会中体现出的影响力。经济发展也有文化力量的贡献，文化力也是一种生产力，对经济发展有着巨大的驱动力。浙江经济发展之所以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浙江独特的传统文化模式或者说文化力在浙江的改革与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影响，构成了浙江经济发展强劲的内在动力。

关键词：文化 文化力 经济发展 互动机制 浙江文化 浙江经济

作者陈寿灿，男，浙江财经学院副院长、教授；颜建勇，男，浙江财经学院助理研究员；黄文平，男，浙江财经学院经贸学院副教授，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博士生。（杭州 310012）

一、文化与经济

众所周知，文化（culture）是个内容相对宽泛、含义多样的概念，不同学者对文化的理解存在一定的差异，迄今并没有形成一致的共识。按照世界著名的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的观点，“文化是指那一群传统的器位、货品、技术、思想、习惯及价值而言的。这个概念包容着及调节着一切社会科学”。^①考据历史，中文语境里的文化，是“文治教化”之意；而西文语境里的文化，源于拉丁文Cultura，本意为农耕和对植物的栽培，后来引申到精神生活领域，意指人类自身智慧、心灵、情操、德行、风尚等方面的培养。

在主流经济学的视野中，文化大多被视为制度的一个方面而被当作给定的外生变量来处理。因之，文化往往与经济学中的“偏好”、“喜好”、“社会偏好”等概念相联系。在经济学研究中，对文化给予较多关注的当属制度经济学。科尔曼把文化视为一种调节经济行动的规则，文化限制着人们做出只符合自己利益的行为，或是促动人们做出不符合自己利益的行为；^②道格拉斯认为，“文化是影响行为的知识、价值以及其他要素在代际间的传递”；^③威廉姆森则强调，“文化是确保雇员理解并投入于企业的目标的社会条件，它在成员彼此有关系的团体内比在一般市场和等级制结构中更重要”。^④可见，不同的学者（包括同一研究领域或不同研究领域）对文化有着不同的理解。西方关于经济与文化的经典理论，主要从以下三类研究进路来展开的：首先，康芒斯对文化所作的制度经济学分析。康芒斯认为，人们的经济活动是以他们共享的习俗文化资源为基础的，习俗文化的本质特征是一种集体的强制。^⑤他把市场中的习俗分为技术的、所有权的和伦理的三种类型，这三种习俗形态构成了市场参与者的利益意识、利润意识、工作意识、工资意识、地租意识和职业意识。市场就是通过习俗来实现经济仲裁。康芒斯对习俗与市场关系的研究，深刻揭示了文化因素对经济体系的支撑作用。其次，马克思·韦伯对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发展的研究。韦伯认为，新教伦理引导了资本主义合理化经济伦理的形成，并成为人们从事经济活动所遵从的价值观与经济动机。他指出，资本主义的兴起并不在于“投

*本文系浙江省社联课题“浙江文化力提升与浙江经济发展的关联研究”（编号：04N21）成果之一。

^①参阅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费孝通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

^②参阅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

^③参阅道格拉斯·C. 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

^④参阅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

^⑤参阅康芒斯：《制度经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

入该行业的资金流,而是新的精神,即资本主义精神”。^⑥这意味着,正是在特定的文化观念作用下,资本主义才得以兴起和发展。第三,贝尔对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分析。贝尔认为,以“效益原则”为核心的经济体系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曾起过关键性的作用,但随着经济体系的日趋非人化或某种程度的异化,它与文化体系的轴心原则“自我表现和自我满足”产生了一定的紧张和冲突。^⑦这表明,文化始终是经济体系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我国,对经济与文化关联的剖析,学术界多从文化与市场经济体制、文化产业、企业文化等角度来研究和界定文化与经济的关联。这类研究强调文化的内在规定性,文化与市场体制之间的逻辑关系,以及文化对社会价值和社会秩序的规范。

但是,上述西方学者对文化的研究,其理论分析的起点是西方文化,或者是以西方为中心的文化,这种研究虽然采取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但由于很难摆脱西方文化价值观的潜在影响,所以就影响了结论的正确和可适应性。而国内学者的研究,则存在实证性不足之倾向,缺乏对文化与经济互动机制的深入分析,对文化的研究没有提升到文化力的高度,其研究结论难免和实践经验产生一定程度的偏离,因而以一定区域为对象,将经济和文化两者间的整合与共进的研究尚存在较大的空间。

二、文化力与经济互动的机制

(一) 文化力的内涵

何为“文化力”?我们认为,将文化与经济关联起来,对文化从价值层面的分析,是文化力。所谓文化力,一般而言,是指一定的文化模式在经济社会中体现出的影响力。1975年,美国国际关系学家克莱因出版了一本名叫《世界权利的评价》的书,书中提出了著名的综合国力方程式: $Pp = (C + E + M) \times (S + W)$, 其中, Pp 代表现实的综合国力, C 代表基本实体(人口和国土面积), E 代表经济实力, M 代表军事实力,这三项代表物质因素; S 代表战略目的, W 代表追求国家战略的意志,后两者属于精神因素。可见,文化力对一国经济竞争力具有重要影响,是属于综合国力的一个次级概念。

那么“文化力”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认为,文化力的内涵有四大要素:一是精神力量,包括价值观、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等。精神力量是无形的,又是能动的,时时刻刻都在经济活动、经济行为中发生影响和作用。同样,对于一个区域来说,一种精神力量的形成,就能向区域的一切领域渗透。二是教育因素,知识经济时代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取决于包括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科技实力等在内的综合国力的竞争,而综合国力的强弱最终取决于人才优势,而人才优势是通过教育来达成的,因此,各国都极为重视教育的发展,把它作为综合国力以及经济建设的基础和核心,摆在优先发展的地位。广大发展中国家面对参与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的新形势和本世纪赶超发达国家的艰巨任务,纷纷对教育发展倾注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三是科技因素,人才优势可以转化为科技优势,科技优势可以使生产潜力获得巨大的提高,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四是和谐发展理念,主要包括经济与社会、城市与农村、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国际经验表明,当一个国家人均GDP进入1000美元到3000美元时期,这个国家则进入了矛盾凸显期。由于各种矛盾加剧,处理得好能够顺利发展,经济发展能够很快上一个新台阶,处理不好经济将停滞不前或倒退。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矛盾凸显期”,存在着资源相对不足、贫富差距扩大、失业、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等矛盾和问题,为了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巩固改革发展的成果,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必须树立和谐发展理念,实现经济与社会、城市与农村、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二) 文化力与经济互动的机制

在研究经济领域的理论和实践时,经济增长的因素总是最为基本的主题。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增长主要包括了四大要素:自然资源、人力资本积累、物力资本积累、技术变革与创新。用总生产函数式可以表述为:

^⑥参阅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彭强等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⑦参阅丹尼·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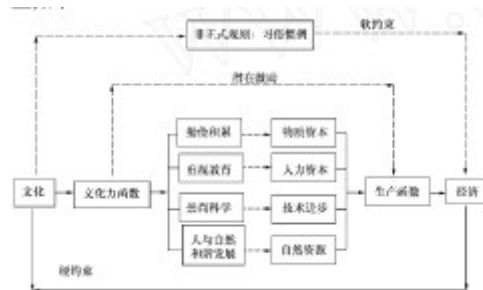
$$QP=Q(M, H, T, S)$$

式中：QP代表产出，其中，自变量M表示物质资本，如机器设备、厂房等；以H表示人力资本，如技术知识对劳动者技能和素质的提高；以T表示技术进步，如专利发明等；以S表示自然资源，如自然资源的丰裕度、消耗系数等。各国经济增长是其人力与物力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和自然资源不同比例组合的函数。

那么，文化力是如何与经济发展实现互动呢？在此我们可以文化力内涵为依据，构建一个文化力函数：

$$FC=F(I, E, R, H)$$

FC代表文化力函数。其中，自变量I表示勤奋、节俭，注重积蓄；变量E表示接受教育和培训；变量R表示科学知识；变量H表示文化思想中的和谐发展理念。通过构建一个与生产力函数相对应的文化力函数，我们可以构建出一个文化力与经济发展的互动模型如下：



勤俭积累形成物质资本。物质资本主要指设备、厂房、社会基础资本、资本积累等。物质资本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经济的发展必须依赖积累足够的物质资本。一个国家的资本存量主要是取决于国民的储蓄，当一国的储蓄较高时，其物质资本存量将快速增长，潜在的产出将增加；而当一国的储蓄较低时，物质资本的匮乏会阻碍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生产率的提高，从而导致经济发展的滞后。勤俭积累作为一种风俗习惯，作为一种财富“储蓄”方式，也是物质资本积累的重要途径之一。

重视教育形成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是指“人们在自己身上投资所获得的，能够增加个人未来收入，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知识”^⑥。这种能力是生产增长的主要因素，它是具有经济价值的一种资本。教育对人力资本的形成具有全面的影响作用，人力资本是通过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来达到的，教育能够提高劳动者智力素质，能够开发、提高劳动者的创造能力。人力资本能够提高劳动者的生产能力和资源配置能力。

崇尚科学推动技术进步。技术进步是在创造和掌握新知识的基础上，进一步在生产领域的各个阶段和非生产领域应用新知识的过程。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深化，技术进步在经济发展和增长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未来世界经济的竞争不再是资源、资本、市场和国土，而是技术的竞争。世界经济中心的五次转移，无一例外都是由技术进步导致的科学技术中心的转移所带动的。一个崇尚科学的民族，必然是一个不断进步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民族。科学是最真实的，最正确的，最可靠的，也是最高尚和最光荣的。树立科学精神，掌握科学知识，运用科学方法，培养科学思维，具有科学态度，是技术进步的关键所在。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推动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增长的制约与影响作用主要表现在它是经济活动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必需，而且其他非自然资源不断增长的物质源泉；自然资源储量的多少、种类的多寡及其质量、结构的状况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速度与质量、结构与效益。

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映着人类文明与自然演化的相互作用及其结果，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依赖于自然，同时，文明的进步也影响

^⑥参见西奥多·W·舒尔茨：《人力资本—教育和研究的作用》，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

着自然的结构、功能与演化,人与自然的关系经历了由和谐到失衡、再到新和谐的螺旋式上升过程。对自然资源无节制的大规模消耗,会造成自然资源枯竭以及生态日趋恶化,严重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主题应是保护自然、恢复自然、改善自然,以使自然资源得到永续利用,并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正如模型所示,文化力函数与生产函数有着高度的对应性,文化力的内涵对经济增长所需的四大要素的形成产生着全面、深刻、持久的影响。经济发展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行为,其中也有文化的力量,而且,其作用越来越显著,越来越突出,文化力也是一种生产力,对经济发展有着巨大的驱动力,经济发展反过来又促进文化力的提升,两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现实中,浙江文化力的提升对浙江经济发展产生的巨大驱动力就是文化力与经济发展互动机制的最好例证。

三、浙江文化力与浙江经济发展

作为一个人多地少,资源相对贫乏的省份,浙江在无资源优势、国家扶持、政策优惠的情况下,能够成为全国经济发展速度最快和最富有活力的省份之一,创造出令世人瞩目的“浙江现象”,并一举成为“经济大省”、“市场大省”和“个私经济大省”,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浙江独特的文化模式即文化力在浙江的改革与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影响,构成了浙江经济发展强劲的内在动力。

浙江是一个有着7000年历史的文明之邦,享有“人文渊薮”之美誉。从新石器时代到春秋战国时代,浙江先民先后创造了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古越文化。从东汉开始,中经魏晋南北朝时期,浙江的学术与文化得到了较大发展和传播,产生了王充等一些著名的思想家。南宋时期形成了以叶适、陈亮和吕祖谦为代表的浙东学派,明朝形成了以王阳明为首的姚江学派和以刘宗周为首的蕺山学派,清代形成了以黄宗羲、全祖望等为代表的清代浙东学派。所有这些学派所反映的思想文化不仅在思想文化史上举足轻重,给予当时乃至近现代的浙江的学术与思想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更为重要的是,为浙江经济社会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其一脉相承的文化内涵直接影响着一代代浙江人的性格、意志、情感思维和价值取向,对浙江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内在动力。^⑨我们认为,植根于浙江传统文化的文化模式或者说文化力的特点有如下五个方面:第一,勤劳俭朴,注重积累;第二,重视教育,尊重人才;第三,崇尚科学,勇于创新;第四,崇尚整体,追求和谐;第五,义利并举,重视工商。那么,具体说来,独具特色的浙江文化力对浙江经济发展、对浙江社会更高层次的现代化,是如何产生有益的影响呢?我们可以根据浙江文化力的五个特点分别进行简要阐述:

第一,勤劳俭朴和注重积累,为浙江经济发展提供了必需的物质资本。浙江是一个“七山一水二分田”的临海省份,人地矛盾突出,自然资源匮乏,工业基础薄弱,发展经济的条件十分困难,但浙江人不受命运摆布,也不消极依靠国家求生存,而是靠走过千山万水,说遍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历经千辛万苦,自己跑码头、闯天下,吃苦耐劳,创造了经济的繁荣。目前,浙江已成为全国民营经济最发达的省份。据最新统计,^⑩“十五”期间,浙江民营经济生产总值、出口货值年均增长45%以上,浙江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占全省GDP比重从2000年47.1%上升到2005年的65%以上。今年以来,私营企业和个体户又以平均每天增长235家和1064户的速度发展。浙江省个私经济总产值、销售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出口创汇额等四项最能反映民营经济综合实力的指标已连续8年位居全国第一。浙江民营经济的腾飞,带来了浙江总体经济的繁荣,创造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神话。浙江人的注重积累突出地表现在资本积累过程中,由于浙江经济基础薄弱,其经济发展的资金多是人们用货郎担一点点挑出来,或是一家人在家庭作坊里用汗水堆积出来的。但是,浙江人从来不曾由于这样积累的辛苦、艰难而中途放弃。

第二,重视教育和尊重人才的优良传统,为浙江经济发展提供了雄厚的人力资本支持。浙江素有重视教育的优良传统,自唐宋及至近代,浙江不仅官学普及于各府、州、县,而且民间办学热情高涨,如精舍、书院、义塾、书堂、社学、私塾、学堂、学校等,形式多样,“耕读传家”蔚然成风。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各类教育获得了良好发展,到2005年年末,全省已拥有普通高校74所,全年研究生招生9577人,在学研究生25637人;普通本专科招生21.54万人,在校生65.13万人;普通高考录取率71.4%,高等教育毛

^⑨参阅习近平《: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哲学研究》2006年第4期。

^⑩数据来源:浙江省工商局网站www.zjaic.gov.cn,2006年9月15日。

入学率达到34%，比上年提高4个百分点。各类中等职业教育招生26.45万人，在校生73.28万人。¹¹浙江重视教育的传统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历史上，据文献记载，从唐朝至清朝，我国历史上有名有姓的文状元615人，其中有籍贯可查的474人，浙江籍有65人，居全国第二位。¹²及至近代、现代，浙江仍然是人才辈出的地方，是名副其实的“院士之乡”，两院院士中浙江籍占了近三分之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浙江重视教育的传统造就了一大批懂经济、善经营的人才，造就了一个辉煌的“浙商”群体，古代的范蠡、近代的胡雪岩、当代的鲁冠球、冯根生、徐冠巨、汪力成、南存辉、马云等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如今，“浙商”已经成为继历史上的晋商、徽商之后，当代中国的第一大商帮，并且享誉中外。人力资本积累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而发展教育则是使人口资源转化为人才资源的关键，重视教育的传统及其良好氛围促使了丰富的人才资源的形成，并进而形成雄厚的人力资本，为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第三，崇尚科学和勇于创新的精神，为浙江经济发展注入了持久而强劲活力。崇尚科学，必然要批判一切虚妄迷信，批判一切错误的思想主张和不合理的制度。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东汉时代的王充自述写作《论衡》的动机与宗旨，就在于“实事求是”，他以求实批判的精神，运用唯物主义无神论的立场、观点与方法，严肃批判了当时流行的“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的歪理邪说以及形形色色的鬼神迷信，澄清了许多被曲解的真理、是非与事理。继王充之后，南宋的叶适、陈亮，明清之际的黄宗羲、清代的龚自珍，以及近现代的大思想家鲁迅，无不是坚持求实、科学的态度，对旧制度、旧思想、盲目崇拜权威进行了批判。在自然科学领域，浙江同样也涌现出了一批追求科学真理的杰出人士，如沈括、李善兰、苏步青、陈省身、严济慈、钱三强、钱学森、黄昆、竺可桢等等。崇尚科学的精神造就了浙江人勇于创新的精神，浙江人勇于创新的精神又为浙江经济社会的发展注入了强劲活力。浙江人富有创造精神，敢于突破旧体制、旧框框的障碍，在思想、观念、机制上创新。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一直是一个制度创新的活跃地区，如：在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中，浙江创造出了“专业市场”这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效实现形式，创造了“以家庭经营为基础，以市场为导向，以小城镇为依托，以农村能人为骨干”的经济发展模式（即温州模式），此外，浙江人还创造了种种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可以载入史册的全国第一，如第一个个体户、第一个“农民城”、第一个关于私营企业的地方法规、第一批股份合作制企业等等，因此，浙江经济的成功似乎可以归结为制度创新的成功。

第四，崇尚整体与追求和谐的发展理念，有利于破解浙江经济发展面临的资源匮乏困境。追求和谐，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大道中生，和而不同，学者们普遍认为，与西方文明的“争”字特质相反，中华传统文化的特质在于一个“和”字。这种“和”的哲理，充分体现在人与自然、人与万物的和谐发展中。作为中华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浙江文化，自古以来一直追求“天人一体，万物一体”的整体和谐状态，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牙雕“双鸟异日”图案和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玉雕“人、禽、兽三位一体”图案，实际上是居住在浙江古老大地上的史前民族的图腾或族徽，它们象征着人与自然、人与万物的和谐统一。这种“崇尚整体，追求和谐”的精神已成为浙江人特有的人文精神，并实践于当代浙江经济发展过程中。近年来，浙江省委提出的强调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八八战略”，以及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的举措，实际上就是一种崇尚整体、和谐发展的理念。“八八战略”的实施以及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将有利于更有效地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以尽可能小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成本，获得尽可能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从而有利于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相互和谐，有利于资源的永续利用。

第五，义利并举与重视工商的商业文化传统，对浙江经济发展产生着长久而深远的影响。“义利并举，重视工商”是浙江传统文化精神的一个显著特征，历史上一些大思想家提出过重要的经济思想和发展经济的主张，如永康学派的陈亮提出“义利双行”，在本末关系上主张农商互补“，商藉农而立，农赖商而行”。永嘉学派的叶适公开批判“重义轻利”、“厚本抑末”的传统观念，认为应该“功利与仁义并存”，而且“抑末厚本，非正论也”，进而提出“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的思想。王阳明则大力倡导“四民平等”的新观念，为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提供了理论依据。明末的黄宗羲则率先提出了“工商皆本”的新思想。这些思想和主张反映了当时浙江民间的社会实践和思想观念，是对当时地方社会心态的概括与提炼，经过广泛的传播，又反过来深刻地影响了浙江地方民间心里，直至今日仍产生着深远的影响。义利并举、重视工商的商业文化传统养成了浙江人对市场机会敏感，商业意识极强的特质。改革开放后，浙江人迅速掀起了务工经商的热潮，义乌从“鸡毛换糖”起步建设初级市场，到形成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走出了一条以商促工、兴商建市的路子。温州在80年代就形成了有全国影响的十大专业市场，现在，在全国许

¹¹数据来源：《2005年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浙江省统计局网站www.zj.stats.gov.cn, 2006年3月13日。

¹²参阅胡兆量等编：《中国文化地理概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多地方都可以找到浙江商人的影子,如浙江村、温州城、义乌路、台州街等等,不仅如此,浙江人还大胆走出国门,闯荡国际大市场。据最新统计,¹³在外省经营的浙江人有近400万人,加上境外的100万人,近500万浙商在外发展、经营的产品70%以上来自浙江。

总之,文化力也是一种生产力。传统文化所说的“富不过三代”指出的便是只有物质财富的传承是不可长久的,以文化力为深层动力的经济发展才是可以持续的。浙江的实践表明,保持和发扬独特的文化优势,并在比较和借鉴其他文化合理内核的基础上,创新传统文化,提升文化力,对于加速经济增长和经济转型,提高经济素质,进而推进现代化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www.yangtze.org.cn

¹³数据来源:浙江省工商局网站www.zjaic.gov.cn,2006年9月15日。